

冯登府三家《诗》著作考述*

房瑞丽

冯登府(1783-1841),字云伯,号勺园,又号柳东,浙江嘉兴人。嘉庆二十五年进士,授福建将乐县知县,不久即离职。后任宁波府教授,上司重其才,拟荐举擢升,力辞不就。他一生以著书立说为业,搜集三家《诗》“遗说异文,疏证精密”。《清史列传》、《清儒学案》中专门立传,总结其学术;其门生史诤撰有《冯柳东先生年谱》^①,是了解其生平事迹较为详细的资料。

目前学界关于冯登府三家《诗》辑佚之研究仅有台湾学者贺广如先生的《冯登府的三家〈诗〉辑佚学》一文,其中概述冯登府的三家《诗》研究,“主要成果有二:一曰《三家诗异文疏证》,一曰《三家诗遗说》”。^②笔者经过查阅,发现冯登府的三家《诗》研究是随着其认识的深入,辑佚观念和辑佚态度的转变而逐步开展的,并形成了一系列的三家《诗》研究成果。以著述时间为序,主要有:《三家诗异字诂》不分卷、《三家诗异文释》三卷《补遗》三卷、《三家诗异文疏证》六卷《补遗》三卷、《诗异文释》六卷《补遗》一卷、《三家诗遗说翼证》二十卷、《三家诗遗说》不分卷,以上六种,笔者经过多方查找得以寓目。现就所见各加介绍,其有不当,恳祈方家指正。

《三家诗异字诂》不分卷

李貽德校,稿本,藏浙江省图书馆。一册。半页10行,行字数不等。封面题“《韩鲁齐三家诗异字诂》”,分为《韩诗》、《鲁诗》、《齐诗》三部分。其中,《韩诗》部分内容最多,其余两家仅若干条。卷端署“汉三家诗异字诂,嘉兴冯登府子苾甫学”。子苾或为冯登府一别署号。天头有李貽德的增校,正文时有朱墨点断,及随文删改夹注。卷末署校记“己巳十一月长至前五日较”,“长至”

*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“清代三家《诗》学研究”(10YJCZH028)、中国博士后科研基金项目(20110491816)、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。

① 国家图书馆藏有民国间抄本。

② 贺广如:《冯登府的三家〈诗〉辑佚学》,《中国文哲研究集刊》第二十三期,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,2003年9月,第305-336页。

即冬至,是李貽德在嘉庆十四年(1809)冬至前五日的校稿。由此可知是稿最晚成于嘉庆十四年底。书底有李貽德跋^①,跋中称赞其为“深宁之工匠”,并点明补注若干条。据笔者统计此校稿中,共增注六十一条,署“貽按”。此跋是貽德在嘉庆十四年“嘉平月”(农历十二月)所作。由此校验贺广如文注^②,可知李氏所跋书名非“《齐鲁韩异文释删减》”,并仅据李氏跋文,亦不能获知“此书系《三家诗异文疏证》之前身”。

《三家诗异文释》三卷,《补遗》三卷

李富孙校,稿本,藏浙江省图书馆。一册。半页10行。钤有黑文方印“石经阁”和朱文方印“冯登府学”。卷端署“浚仪王应麟集考,嘉兴冯登府云伯学”,其中“云伯学”二字删改为“疏证”,不知是冯氏自改抑或李富孙校改。由此删改可以看出,此《三家诗异文释》(以下简称《异文释》)亦即冯登府关于三家异文的疏证,与后来成书的《三家诗异文疏证》(以下简称《异文疏证》)有密切的关系,下文的比较也证实了这一点。书前有张昌衡序。天头有李富孙校注。卷末有校记“壬申四月廿五日较一过”及钤印“子云图书”,此“子云”或与《三家诗异字诂》(以下简称《异字诂》)署名“子芸”一也,乃冯登府别号,即嘉庆十七年(1812)四月二十五日,冯氏校后所记。书底校记“丙子六月李富孙校读一过于吴门馆舍,大暑后一日挥汗书”,是李富孙嘉庆二十一年(1816)六月大暑后一日的校记。在卷一《韩诗》的末尾有校记“丁丑二月寒食夜校改定字”,当是李富孙嘉庆二十二年(1817)二月的寒食夜又对个别字句进行了校定。

《冯柳东先生年谱》中记载:“嘉庆十八年(1813),《三家诗异文考证》成,张尧民为之序,属史生詮校录。”尧民,即张昌衡号。此《三家诗异文考证》当为《异文释》,据稿本校记可知应当成书于“壬申四月”,即嘉庆十七年前,《年谱》稍误。

①李貽德跋云:猥以尊注委德餘校,印誦之下具见于三家异同、通借之故,借流溯原,剖豪晰茧,训诂而外,得是洞观斯风雅之余音,亦深宁之工匠已。德幼既不学,壮处多冗,乃蒙雅度,刍蕘是询。谨检搜往籍,剿略时贤,仅得如干条以复燭火,系补于高明,横污负惭于清睛。仆何人,敢放任是役,名山之业,桀惟拭望而已。嘉平月次白貽德书跋。

②贺广如《冯登府的三家<诗>辑佚学》注释:“据陈鸿森《清代三家<诗>著述考》(未刊稿)得知,云伯同里李貽德曾校跋云伯《齐鲁韩异文释删减》一书,李氏之跋今存于浙江图书馆中,据其跋文,知此书系《三家诗异文疏证》之前身,并且此书又是自《三家诗异字诂》一书修改而来,因此,由《三家诗异字诂》,到《齐鲁韩异文删减》再到《三家诗异文疏证》,乃一层累的增修过程,三书的内容主要均着力于三家《诗》异文的考证上,足见云伯于此所下功夫颇深,而其成果主要则呈现于《三家诗异文疏证》一书之中。”

《三家诗异文疏证》六卷,《补遗》三卷

刻本,藏上海图书馆。封面题“汉三家诗异文疏证”。半页11行,行22字,左右双边,粗黑口,象鼻,单黑鱼尾,版心镌书名、卷次、页码,书牌记“道光庚寅年六月四明学舍开雕止十月竣工”,可见刻于道光十年。

书前有张昌衡序^①、陈寿祺序、冯登府自记及总目。陈序称赞是书“辨形声,核诂训,未有如此编之精博不刊者也。”冯登府《自记》云与范家相等人的三家《诗》辑佚之作相比,此作乃“不欲为雷同之学”而“专疏异文”,据王应麟《诗考》“所引三家异文略有疏证”,并明确“订正”结果“厘为六卷、《补遗》三卷”。可见此《自记》作于《补遗》完成之后,故我们可以推测《异文疏证》的成书时间最晚应在撰成《自记》的“嘉庆二十二年春正月”之前,因而贺广如推测著作时间“最晚应在于道光十年左右”^②欠妥。冯氏所著《石经阁文初集》中录有《〈汉三家诗异文疏证〉自序》,与上述《自记》相比,除个别字句有所更改外,在段前增述道:“夫汉、魏以来诸书所引,惟韩独多,而蔡邕之石经、《独断》,孔安国之《书传》,司马迁之《史记》,班固之《汉书》、《白虎通》,刘向之《说苑》、《新序》、《列女传》,包咸、何晏之《论语》,并本《鲁诗》;匡衡、翼奉、萧望之及景鸾图纬之说,皆为《齐诗》,其古义尚可考见。”^③而“其序文中所言归属于《鲁诗》的诸书,其实并未在《疏证》中全然实现,反而是在《遗说》一书才具体落实了此一作法”^④。可见此《自序》撰于《异文疏证》成书后。并由道光十年本只刊《自记》并未刻《自序》亦可知,《自序》的增改应该在刻本刊定之后,否则,在刻本中就不会刊刻修改前的《自记》了。并就诗家归属推知,刊刻《异文疏证》后,冯氏对于三家《诗》“古义”又有了新的认识,故思考着关于三家诗异义的问题,并最终在《三家诗遗说》中得以体现。

在《总目》中,卷一至卷四为《韩诗》、《鲁诗》、《齐诗》各一卷,共六卷。《补遗》三家各一卷,共三卷。又有《三家诗异文综补》六卷、《三家诗异义综补》四卷,均标示“嗣出”,即这两部分尚未完成或此次未刻,以俟他日补刻。并注明字数“《异文疏证》六卷都三万零六百六十一字,《补遗》三卷都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九字”。署刊工“四明沈大业写样,蒋文照镌字”。卷末署“门人史詮、陈文垣,弟登雋,男多士、多侯,孙男稻生覆校”。

①此张序与《异文释》中是同一序。《三家诗异文疏证》六卷,《补遗》三卷,稿本亦藏上海图书馆,其中张序署名为“勺园旧史冯登府自叙”,并钤有“冯登府”和“得庵”二方印。从《异文释》及《年谱》记载可知此序为张昌衡作,稿本署“冯登府自叙”之原因待考。

②贺广如《冯登府的三家〈诗〉辑佚学》:“根据学海堂所编《皇清经解》的道光九年初刊本未能收入是书,以及张祝平先生记载四明学舍所刊的《三家诗异文疏证》刻于道光十年(1830)等讯息判断,应可推测《疏证》的著作时间,最晚应在于道光十年左右。”

③《石经阁文初集》卷一,清道光十一年刻本,上海图书馆藏。

④贺广如:《冯登府的三家〈诗〉辑佚学》。

三书相比较,不同如下:

其一,《异字诂》每家诗前均有“提要”,即《韩诗提要》、《鲁诗提要》、《齐诗提要》;《异文释》则没有“提要”。《异字诂》不分卷,《异文释》则分为三卷,每一家诗即为一卷。并有三家《补遗》部分,内容很少,均为数则。

其二,《异字诂》在诗篇名后多收录有一段此家关于全诗宗旨的概括,《异文释》篇名后没有全篇主旨性的论述,直接是对相关异文的疏释。

其三,《异文释》吸收了《异字诂》中李贻德的增校,进行了局部的调整,在原文和天头有较多校改之语,增补了一些引文的出处,当为李富孙增校。《异文疏证》则承袭《异文释》而来,并对其进行进一步作了修改、整合。

据内容比较可知,三者基本部分同者十之八九。《异文释》是在《异字诂》基础上修改而来的,二稿均有较多的删改圈涂痕迹,说明此二稿均为未定本。据著述时间和版本讯息,《异字诂》和《异文释》是《异文疏证》付刊前的初稿、二稿,《异文疏证》则是最后的定稿。从文本内容上来说,前两稿可能价值有限,但从了解冯登府三家《诗》辑佚研究发展的轨迹及其《诗》学思想发展的角度来说,意义颇为重要。

检视三稿本的完善过程,我们可以得出:

一、《异字诂》是冯登府关于三家《诗》研究的初步思考,故完全仿照王应麟《诗考》体例,而到进一步修改成《异文释》时,随着研究的深入,发现完全仿照《诗考》会造成体例不一,因而删除了每家诗前的“提要”及三家关于诗篇总旨的论述。虽然关于篇旨遗说的论述与对异文考证的体例不太符合,予以删除,但他并没有忽视这些遗说的存在,故后来又著述《三家诗遗说》。可见,关于三家《诗》遗说的思考贯穿冯氏三家《诗》研究的始终。

二、《异文释》吸收了《异字诂》中李贻德的增注,而《异文疏证》又吸收了李富孙的校改。并在具体异文疏证过程中,间有引用时贤的成果。如在初稿《异字诂》中,冯氏并没有运用金石文字材料进行考证,到二稿《异文释》中,就吸收了李贻德运用金石文字的增注,而在最后的定稿《异文疏证》成书时,冯氏在金石学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,故更加积极运用金石碑传资料考释三家异文,成果显著。因此可以说,友人的启发,查漏补缺,完善着冯登府的三家《诗》研究,也可以看出当时学者的交游切磋之情谊。

三、从三稿本辑佚材料的选取来看,前两稿仅从《释文》、《文选注》、《汉书》等典籍中,先列出所存在的异字,然后运用《尔雅》、《说文》、《玉篇》、《集韵》等一些字书、韵书中相关记载,进行考证。然初创之作,所考证多较简单,并有一些失考之处。到《异文疏证》不仅引用一些字书、类书、史籍、传注等相关的记载,而且青铜铭文、碑传资料及一些佛经音义的运用更加娴熟。在借鉴时贤考证成果的同时,间有指瑕其失当之处,如《韩诗·君子偕老》,冯氏考证云:“‘媛’本有‘援’义,‘援’训‘助’,‘取’当是‘助’之误。范家相谓邦人之取法,盖不知‘取’是‘助’之讹而强释之。”指出范家相失考之处。与前两

稿相比,《异文疏证》疏释更为详实,考证更为精审,所涉及资料也更广泛,亦是其超越前两稿乃至最后定刊的原因。

四、前两稿本的存在,说明冯登府《异文疏证》的完成,从最初的创作到最后的刊刻,至少经过了三次大范围修改,历经十馀年,并吸收了李貽德、李富孙二人的校注成果。可以说,《异文疏证》是冯登府长期积累,几经修改,对三家《诗》辑佚研究反复思考的结果,这在清人三家《诗》辑佚中,乃至《诗经》研究史上都是不多见的,可见,冯氏治学之严谨。亦可知阮元为何见之即亟编入经解中了^①。

阮元在《冯柳东〈三家诗异文疏证〉序》中评述:“柳东太史,潜研经史,精邃博综,实欲突过前哲,其言‘三家多今文,毛多古文;三家多正字,毛多假借’,按之群书,无不融合,又推原传授诸儒,有以知其说之所宗。——派别而诂证之,由形声而得训诂,由训诂而得义理,俾千古微学,一旦揭日月而列星辰,则三家虽亡犹存也。”如果说《异文疏证》重在“由形声而得训诂”,尔后的《三家诗遗说》则是“由训诂而得义理”之作,两相结合,成就了“千古微学”三家《诗》的“虽亡犹存”。

《诗异文释》六卷,《补遗》一卷

稿本,藏复旦大学图书馆。三册。扉页识语“先将《诗异文补》先后录一本,王氏异文原文录一本。补齐、鲁廿条”。后题“是卷尚多误处,未经校过,丙戌冬月记”,钤印“得庵”,得庵是冯登府一别署号。由此记知是稿成于道光六年(1826)。据上文知,此时《异文疏证》已经完成。卷端署“浚仪王伯厚辑,嘉兴冯登府释”,后有钤印“登府手校”。天头处有臧寿恭、汪远孙、赵坦的增注。

对照《异文疏证》可以发现,凡是《异文疏证》所疏之异文,《诗异文释》一般不再考证。《诗异文释》重点在与《毛诗》比较上,先列出有三家异文的诗句,而不具体区分某一家,然后注明毛作某,以案语疏释。此稿反映了冯氏对辑考三家《诗》的进一步思考。三家师承比较复杂,在《异文疏证》中的严格区分三家可能也并非汉代实际。故在完成《异文疏证》后,解决典籍中遗存与《毛诗》不同而又难归属三家中某一家的异文,是冯氏面临的治三家《诗》的一个难题。《诗异文释》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而进行的努力。该稿没有最后成书,亦说明此一著述方式及呈现的结果不能实现冯氏三家《诗》研究的目标。但这一不具体区分三家的体例,以及对三家异义的思考,启发着冯氏下一部著作

^①阮元主持编纂《皇清经解》,由广东学海堂刊刻,至道光九年完成。当时并没有收录冯登府的《三家诗异文疏证》,今所见《皇清经解》中所录冯登府《三家诗异文疏证》在千四百零七、千四百零八二卷,乃后来续刻。阮元《冯柳东〈三家诗异文疏证〉序》云:“曩余在广州开学海堂,积说经之书为《皇清经解》千四百卷,而独缺三家《诗》、石经。今于滇中始得见之,爰亟为编入续编,并叙而归之。”

《三家诗遗说翼证》，故才有《三家诗遗说》的完成。因而，此稿亦在了解冯氏三家《诗》发展轨迹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如冯氏所言是稿“尚多误处，未经校过”，故仅有此孤本，而鲜为人知。

《三家诗遗说翼证》不分卷

残稿本，藏复旦大学图书馆。四册，无卷次。卷末署校记：“丙申（道光十六年）五月二十九日李富孙校过”；“丁酉（道光十七年）七月望日柳东亲校定，时目疾初愈”，钐“柳东”印；“己亥七月廿四日校过，可作定本，即付清缮。八月丁酉未日三校定”，后有“登府”印，道光十九年（1839）《三家诗遗说翼证》（以下简称《遗说翼证》）定本以成；“庚子六月至十一月止，即将此书以类分编，成《三家诗余论》，详于义理而略于训诂，已成初稿，将付史生书之，此书竟可废。有清本在汪又村适处，请元和陟石甫校定，已阅年矣，将索归，□至前十日觉老人记。”“觉老人”亦冯氏自指。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年，冯氏又对《遗说翼证》进行分编，此本遂废，今所存残本仅从《大雅·文王》开始。

《遗说翼证》体例以三百篇顺序编排，从其他典籍中征引有关诗说、诗评，系于诗句之下，以呈现与毛说的不同，不具体强分三家。与《三家诗遗说》相比较，有些辑佚内容二者完全相同；有些则《遗说翼证》更为繁琐，比较杂乱，系统性和条理性不强，有资料堆积之嫌，并有明显圈改删涂痕迹；而《三家诗遗说》则结构统一、条理清晰，并“详于义理而略于训诂”。故《遗说翼证》卷末所云“分类摘编”而成的“《三家诗余论》”即是《三家诗遗说》。因而，《遗说翼证》是《遗说》的前期成果，是完成《异文疏证》及尝试著述《诗异文释》仍觉不理想后，既苦于强分三家的不妥，又发现三家《诗》不仅有大量异字存在，而且异义遗说也非常值得探讨，故三家综合编排，形成一些具体的三家遗义，而成就了《三家诗遗说》。可见《遗说翼证》仅是废除之草稿，而后来学者多未考其详。如《书目答问注》所载冯氏“别有《三家诗异义遗说》二十卷，未刻”^①，即为未刻的《遗说翼证》二十卷。当今学者亦有云：“对于汉以后就已亡佚的齐、鲁、韩三家学说的搜集，清嘉道以后著述日多。有冯登府《三家诗异文疏证》九卷，《三家诗异义遗说》二十卷。”^②此二十卷的《三家诗异义遗说》当指《遗说翼证》，而殊不知《遗说翼证》乃残废稿，其成果在《三家诗遗说》中得以体现。

《三家诗遗说》不分卷

稿本，藏国家图书馆。三册，半页11行。前两册为冯登府《三家诗遗说》

^①张之洞著，范希增补正：《书目答问补正》，北京燕山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18页。

^②陈其泰、李廷勇著，张立文主编：《中国学术通史·清代卷》，人民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219页。

(以下简称《遗说》)的誊清稿,也即定稿,但涂改仍比较多。有钤印“冯氏伯云”,后署完成日期“庚子十一月十八日”,即道光二十年(1840)十一月,与《遗说翼证》识语中分编成《三家诗餘论》的“庚子六月至十一月止”时间是一致的,亦可证明摘编而成的《三家诗餘论》即此稿也。第三册是初稿,从《东方之日》开始,其中所录多不完整。后有识语:“此卷依前后次序,尚总数数说未成。此书成于红夷滋事之时,司马公所谓发愤成书也。未起何日得清一稿。此卷自二日初始清稿,大計二十前后可举再补总论数篇,复可成书。多抄即心烦,只好日限三纸,二十日、十八日定也。”钤印“甬生”,即登府。可见,定稿即为在初稿完成后的誊清稿。完成于“红夷滋事”,即鸦片战争开始之际。当是冯登府官居宁波府,心有郁结,发愤著述。但身体每况愈下,故只能“日限三纸”。

《遗说》按照三百篇的顺序编排,共涉及《诗》二百一十九篇,并有四篇总说:《周南召南说》、《鲁颂说》、《商颂说》、《齐诗说》。主要是从典籍记载中钩辑三家遗说,从而进一步解释三家训《诗》之义。除有明确归属某家者外,一般以“用三家说”等统言之,不强分三家,反映了三家遗说存在的客观现实。

与《异文疏证》及《遗说翼证》等前期著述相比较,《遗说》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增加了一些三家《诗》说与毛义优劣的判定,多以三家胜毛。此一明确态度亦是在今文经学思潮兴起的学术背景下,受到魏源等今文三家《诗》学思想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。书中除较多引用“我友魏源”之说外,还引用了其他诸多学者之成果,如称阮元为“我师阮仪征”、“吾师仪真相国”、“我师阮仪真”;称王引之为“先师王尚书”、“先师王文简”及“我友李富孙”等,从称呼中亦可看出受他们影响之深。从上述著作中诸同里友人的增校及此著中引证诸多时贤成果,可以说,冯登府的三家《诗》研究是与众友人交游切磋的结果,亦可得窥当时学者学术交流及学术风气形成之一斑。

另《三家诗遗说》八卷,《补》一卷。李富孙抄校,抄本藏天津图书馆。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76册影印此本。半页11行,行23字。后校记云:“壬寅人日,李富孙校过,时年七十有九。为之泫然挥涕,亦不负病时所属也。”“壬寅人日”,即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七,李富孙在冯氏去世后不久,以七十九岁高龄,遵好友嘱托校抄完成。门人史诤“元默摄提格小春月”(即道光二十二年十月)誊抄。并在第八卷附有《三家诗遗说补》一卷,是关于“《齐诗》”的增补,有记:“我师于辛丑春抄自四明官舍,寄命校录,嗣增草稿,陡主蓉城。今秋晓暉世兄出示遗集中有几叶在所增之外,恭誊以附八卷之后,门人史诤百顿首谨注。”

李富孙抄本《遗说》八卷,正文内容和标注遗说出处等都有所增补。并对稿本中诗篇顺序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,使其与今本《诗经》诗篇顺序一致。笔者核查发现,无论是冯登府原稿本中,还是李富孙抄注本中,都有一些引文出处不实及篇目、卷次及作者误引的现象,共计二十七则,拟另文探讨。

综观上述冯登府三家《诗》著述六种,前四种大致可以概括为异字疏证系

统,后两种属于遗义探究系统。在异字疏证系统中,以刊稿《异文疏证》为代表,《异字诂》和《异文释》分别是初稿、二稿,《诗异文释》是著述成《异文疏证》后,为弥补三家归属问题的反思之作,虽未补憾,亦唱响了遗义探究的前奏。在遗义探究系统中,以《遗说》最终成书,《遗说翼证》仅是《遗说》的草创之作,并未有完稿存在。从《异文疏证》到《遗说》,二者的不同及其中所透露的讯息,展示了冯登府三家《诗》学思想发展的轨迹及道光年间学术思潮的发展变化。概括如下:其一,从结构上看,由三家分说到不强分三家,反映了冯氏依王应麟《诗考》体例深入研究时,遇到了困境,并找到了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就是三家综合编排。此亦是范家相等诸多治三家《诗》学者遇而未决的难题。其二,从辑佚角度的选取来看,由对异文的考证到对遗义的探究为主,反映了冯氏对乾嘉考据学派“由小学以通经明道”^①学术宗旨的贯彻,此亦是乾嘉学者治学之圭臬。其三,在辑佚材料的选取上范围不断扩大,辑佚方法不断拓展,“由原先最可靠的直引法,发展出师承法及推臆法,使辑佚内容较原先丰硕。”^②表明了冯氏对三家《诗》之“家法”、“师法”有了新的认识,这也是清代学者传承汉学中一直探讨的问题。其四,在辑佚态度上,由《异文疏证》中对四家《诗》的客观比较,到《遗说》中三家多胜毛的判定,既反映了随着研究的深入,对三家《诗》认识的逐步深化,亦表明受到魏源《诗古微》中张扬三家大义而今文治经观念的影响,透露了社会思潮对学术研究的冲击。总之,冯登府的三家《诗》研究,既受乾嘉汉学传统学术方法的指导,又受嘉道间兴起的今文经学思潮的影响,汇集了众多学者的考证成果,交织着嘉道间诸多的学术讯息,在三家《诗》研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,不应被忽视。

作者单位: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

①戴震:《古经解诂序》云:“经之至者,道也。所以明道者,其词也。所以成词者,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。由文字以通乎语言,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,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,而不可以躐等。”(《戴震文集》卷第十,中华书局,1995年,第146页)

②贺广如:《冯登府的三家〈诗〉辑佚学》。